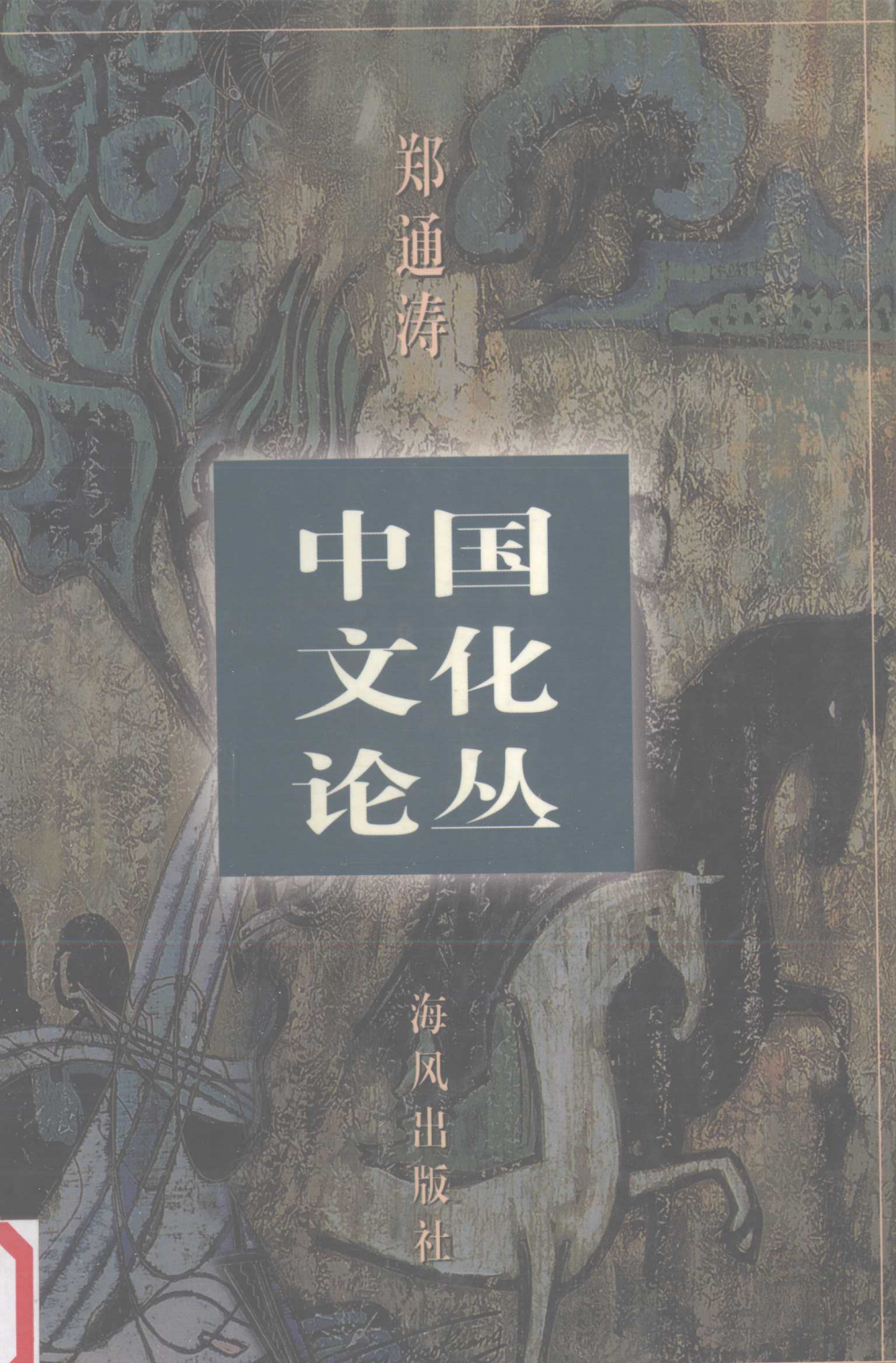




郑通涛

中国文化论丛

海风出版社

郑
通
涛

中国
文化
从
文
论

5

H319.4/1260

海
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论丛/郑通涛著. —福州:海风出版社, 2000. 4

ISBN 7-80597-298-2

I. 中… II. 郑… III. 文化-专题研究-中国-文集

IV. G1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135 号

中国文化论丛

郑通涛著

*

海风出版社出版

(中国·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福州泰岳印刷广告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8.75 印张 20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一版 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ISBN 7-80597-298-2

G·32 定价: 28.00 元

序 言

中国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是世所公认的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汉司马迁的《史记》有《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颡顓、帝喾、帝尧、帝舜时的史实。唐代司马贞则补入了《三皇本纪》为庖羲、女娲、神农。宋代罗泌《路史》则记述了盘古开天辟地的事。这样，愈到后来反而愈知道先前远古的事，难怪引起人们的怀疑了。时至近代，海禁大开，中国接触到西方的文化科学，不免对自己的学术思想等等进行了反思。择善而从，融会贯通，更是学者们所应持的态度。郑通涛博士青少年时期求学于国内，后复负笈、执教于海外。有汉学之根基，复能吸收西学之精华。积其近年来所撰写之学术论文汇为一编。其中个别篇章已见之于国内外学刊。而兹编之集者，窃以为可分三类言之：一，为寻本探源之论，如：《汉

字起源一元说之质疑》、《“美”字的初义研究及古代中国人美意识的形成》、《释禹步——兼论中国戏剧舞蹈步伐的形成》、《“易经”为“彖经”之探讨》，均能就旧说之不足者，加以新意发挥。复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虽然，某些问题，仍可继续讨论，但就已有材料说，亦能成一家言。二，为辩明以申己说，如《老子的“道”与“无序”理论》、《屈原为巫师说》、《“九歌”为“鬼歌”说》。其中后两篇，为两千多年来一向有争议的问题。屈原这位第一个写中国最长的抒情诗——《离骚》及其他篇章的大诗人，备受人民的爱戴，五月龙舟竞渡的故事，直到现在仍在海内外流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文学弄臣”说之遭非难，“巫师说”如何摆脱屈原曾为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以及他出使、流放等事。还有《离骚》中所赞赏的儒家理想圣君尧舜等等似乎都可以进一步再探讨。不过屈原受巫师影响之深，当是不言而喻。“九歌”为“鬼歌”说，就“九”“鬼”二字同义异处而言，有其相同之处，但“九”“鬼”又各有其不同之意义，实难混一言之。然就篇中所言之“九”“鬼”相通处仍可成说。兼论其与傩戏之关系，实发前人未发，似可以成一家言。三，为论艺术与道的关系，虽仅为一篇《中国山水画

中的有序与无序》。实际上接触面较广,论及艺术与道之关系;也述及书画同源异流问题。山水画法自然,道法自然,确实可以相提并论,探其幽微。作者是力求做到这一点的。不过由于书画鉴赏,必须观其作品,对物品评,当更加深阅者印象。忆吾昔随宗白华师学美学,宗师时常带我们观赏名画、名字、古物等,以提高我们鉴赏能力与精神境界,迄今未能忘怀。斯篇如能加以插图,则必更为完美。惟兹事体大,非一篇文章所能解决的。郑君正值壮年,当可赓续为之。

从上所述,我们知道作者所涉猎的范围颇广,但时代则侧重于中国上古时代之文字、诗歌、哲学、美学、戏舞、书画等方面的研究。除接受中国优良的传统学说外,更参以西方的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等,惟善是从,为我所用,以申己说。所以这些论文都是有新意,而又高层次的。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

谨以为祝,乐为之序。

金启华 1994.11 月于新加坡国大中文系

目 录

汉字起源一元说质疑	(1)
“美”字初义及古代中国人美意识的形成	(38)
释“禹步”，兼论中国戏剧舞蹈步伐的形成	(82)
“易经”为“彝经”说初探	(98)
老子的道与无序理论——“无序”与“无”及“有”	(120)
屈原为巫师说	(139)
“九歌”为“鬼歌”说——兼论《九歌》与傩戏的关系	(164)
中国山水画中的有序与无序	(195)
试论修辞艺术的审美距离	(237)
古无轻唇音再证——兼论方言在古音研究中的作用	(262)

汉字起源一元说之质疑

汉字有据可查的历史大约有八千年。这就是近年来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一批甲骨契刻符号。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比西安半坡仰韶时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和山东大汶口时期陶器上的文字分别早 2000 到 3000 年,这是目前汉字起源最早的实物资料。

几千年来,对汉字起源的单一性或多源性的问题的研究几乎是一项空白。原因在于大一统思想的作怪。即使对有着极其明显的不同特征的文字,也极力从同一起来源的角度来描绘该文字体系。如河南舞阳的文字被归纳为“有个别形体同殷代甲骨文的字形颇近似。^①”因而“从贾湖甲骨契刻符号,到西安郊区原始甲骨文,再到殷代甲骨文,从发端到逐渐完善,最后成熟,甲骨文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②”很明显,既然只有“个别形体”的相似,又怎么能算作同一个系统的文字呢?

近年来随着新的文物的发现和对民族、文化、历史的重新考查,这种汉字起源的单一性学说也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问题在于,对先秦以前的诸种文字系统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巨大的差异性不能视而不见,不能简单地归纳于一种文字系统的变体。因为与文字学相伴而行的民族、文化及历史史实否定了汉人的

来源是单一性的提法。汉族的来源是多元的,汉族的最早祖宗是由操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原始部族所融合而成的。正是这种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语言的民族导致了不同文字系统的产生与应用。在民族融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语言的融合,文字也渐趋统一。到秦代为止,中国统一的文字随着秦始皇的“书同文”政令而确定了下来。正是这种民族与语言的大融合,导致了中国书面语上的最突出现象,即假借现象的产生。先秦这一段时期是中华民族融合最为复杂的时期。这种民族文化语言的交合使人们对先秦典籍阅读产生了不少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的起源必须结合民族、文化及语言上的根据来进行研究。

先秦文字语言及其特征

先秦文字一共可分为以下几大类别: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小篆,以及统属于春秋战国时代文字的石鼓文,楚文等。此外,史书还记载过有秦书八体的文字。《说文·叙》:“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书·艺文志》记载这样的一段话:“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又以冰体试这,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倍也。”以能识别这些不同体系文字的能力高低来授予官衔,因此可见当时语言文字的复杂程度。这里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汉代人对前代留下来的多种文字系

统已不能辨认。第二,当时社会上还使用着这多种不同系统的文字。不能辨认的原因很清楚:不同来源的各国文字。《说文·叙》描绘过这种多种文字并存的局面:“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戒严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文字异形的原因在于言语的异声。这很清楚地说明了导致这种不同文字系统的产生原因是语言不同的缘故,而语言不同的原因在于汉族是由许多操不同语言的民族所组成的。因而,即使到汉代,这种民族融合的痕迹仍然体现在文字上。

中原古语大约是殷商以前传至周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标准交际语。《论语》中有过“雅言”的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是也。”《荀子·荣辱篇》中所讲的“君子安雅”指的也是这种雅言。但是雅言是相对于“非雅言”的语言的。《尔雅》就是近正之意,因为“尔”是“近”之意,“雅”是标准交际语,因此刘熙《释名》中讲到:“五方之音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因而在《尔雅》中出现了以雅言释其他语言(方言)或古语的方式,如以“始”来释初、哉、首、基、肇、祖、无、胎等字。“始”是雅言,而其余的是其他误言(方言)的相等词汇。这种差异无论是从语音上或形体上来看都是很大的。《孟子》中有“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的楚人学习齐语困难的记载。《荀子·荣辱篇》也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等有关不同语言并存的记载。所谓的“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恰恰说明了先秦时所谓“五方之言”的确是存在的。北齐颜之推《家训·音辞》也指出了这种多语并存的现象是古而有之:“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皐,北方曰译。”《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戎子驹支的话:“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

同，货币不同，言语不达。”因而先秦各民族之间的交际必须通过翻译，比如《史记·秦本记》有过这样的记载：“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在戎人中能讲晋国话，在当时大约是很希罕的，所以司马迁特意在此补上一笔。我们知道早期汉民族至少融合东方以鸟为图腾，西方以熊为图腾以及南方以虎及龙为图腾的荆楚与百越等三大民族而形成的。这三大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及文字。而今日的汉字是在这三大部落被融合后由胜利者一方民族所规定的，即战胜国民族使用的文字。这就是殷周文字。

战国时的吴越仍保有自己的语言。如吴的国名有攻，攻吴、工敝、吴等多种写法。国名一般都是固定的，而为什么吴国却不那么固定？唯一的解释是这些名称是用当时的通语音译出来的。吴王光又叫阖庐或阖闾，同样也是音译之故。同样的，越语与当时的通语也不一样，越国铜器铭文人名如“鸠浅”、“者旨于赐”、“州句”等，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取名的本意。如上所述，也是当时通语的音译词，巴蜀语言及文字与当时通语也不一样。^③《荀子》中也多次出现了与当时汉语不同译词如《议兵》中“触之者角摧，案鹿埴陇种东笼而退耳”、“矜纠收缭之属”中的文言虚词“案”和“鹿埴陇种东笼”（今天的“叽哩咕噜”，形容败退的样子）、“矜纠收缭”（不讲道理，胡搅蛮缠之意），都不是当时通语中的词汇。齐鲁后为楚地，因而《荀子》中有许多楚语。此上种种说明，先秦时的言语各自不同。出现在先秦史籍中的字“字型变化无常，有些字往往昙花一现，以后再也不见出现”的现象，^④就是各种不同文字体系在这一阶段相互碰撞的结果。

先秦文字系统中，最可怀疑的是楚文字，很少被提及的巴蜀文字，以及秦书八体中的一些文字如鸟虫书、奇字等文字。甚至

争议较少的六国文字在来源上也是模糊不清的。传统的看法认为,上述文字与殷周的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出于地理原因而产生的文字变体而已。但是详细地考究一下这种说法,可以发觉到有几个无法解释的问题。首先,甲骨文在殷商之际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其字体字式都基本固定了下来,何以传到六国文字时却大都不符呢?“取《说文》古文,以与商、周、六国文字相较,得字七十有九,其合于商、周也四之一,其合于六国也四之三,则知汉代所谓古文,即六国文字。^⑤”也就是说,所谓的六国文字(汉代古文)与商周文字相似性才达四分之一,可见六国文字与商周文字的来源并不是一脉的。

楚语、楚文化与楚文字

有人认为,周代尤其是东周的文化是以楚文化为其代表的。比如说,最早用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的青铜器,是最近发现的楚器。最早的铁器包括农器、匠器及兵器都是近三十年间出土的楚器。先秦的金币和银币,无一不是楚币。最早的精美逾常,完好如新的丝织品,竟出自于一座小型的楚墓。先秦的漆器,就数量之大,类型之多,图案之美,无过于楚器。先秦的木雕工艺品和竹编工艺品,凡已出土的,几乎全数来自楚墓。相传秦时蒙恬始作毛笔,但楚墓中已出土多支早期的毛笔。先秦的竹简,几乎全是楚简。先秦帛书,现仅有两幅,也都出自楚墓。现存最大及水平最高的一大套六十五件之多的曾侯乙编钟,是从楚国腹地的随县擂鼓墩1号墓发掘出来的,“其铸造工艺及音色音域,堪称稀世珍宝^⑥”又如,先秦箸食文化的唯一例证,是楚人的遗物。

最早的一架木床，也是楚人的遗物……^⑦与当时的古希腊比，“从文化的总体成就来看，楚与希腊难分轩輊，它们从不同的方向出发，都登上了古文明的峰顶。”^⑧楚文化就其精髓的内容来讲，如青铜铸器，彩绘漆器，木构台榭，木雕及音乐，都比古代希腊来得进步。^⑨东周文化精华实际是由楚文化所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楚文字的产生是必然的。由此可见，在青铜器产生之前，中国社会必定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发明及发展的历史过程。较大规模的生产如楚青铜器及有关物品的产生，若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及交流，仅凭个人的才能及智慧完全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即使铸铜工匠具有极其丰富的知识，即使有关人员的整体组织操作极高，都需要借助语言及有关的文字记载。此时应已产生高度统一的文字，已超过记事、象形绘物的阶段，这种设想是合理的，如同巴蜀出土的三星堆铜器一样，楚青铜器体现出来的高度技术性在没有文字交流下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的。综上所述，楚文化相对独立于殷周，楚国早期的文字如蝌蚪文之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产生于殷周甲骨文书体系的。楚国的古文字是有其独立来源的。

楚文字的来源是上述几种文字中最有争议的。其产生及消失都没有很清楚的线索可查，因为庞大的楚国在民族的融合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楚文字也在殷周系文字的碰撞之中消失了。楚民族在为秦民族征服之后，转而采用胜利者的语言文字。但是因为自身传统语言文字的惯性，在有关楚器铭文、楚简、及帛书文物及仍强烈地表示着这种与当时中原文化不同的风格。比如出土的《仰天湖楚简》的楚文字与其它文体极其不同。其文字“露锋落笔，行笔略按，提笔逸出，笔画呈两头尖中段粗。此种书体后称之为‘蝌斗书’，通行于春秋战国……取势大多横扁，横画

多作昂起的圆弧形。”^⑩楚文字“字体奇肆，于此见荆楚雄风”“文字奇雄，不类齐鲁，可视荆南霸气矣。”“奇古雄深与他国迥别，且俱在未称王之时。”《春秋正义》引王隐《晋书·束皙传》说：“科斗文者，周时古文，其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这种所谓蝌斗文，大约就是楚国自己的文字。楚地处江汉，属蛮夷之地，楚人自称蛮夷之人：“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史记·楚世家》）。楚语是与殷商系语言不同的，如称乳虎为斗谷于菟。楚熊仪之称为若敖，熊坎宵敖，子平为瞽敖。楚之尊官为莫敖等。这些都是楚语的音译。汉代服虔在《左传》襄公十二年注中曾说过：“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指的是楚语中由于发音时的轻重缓急，以及多音节的组合方式而产生的单音节语音形式。“夷言多发声”指的是声母往往带出韵母现象；“数语共成一言”指的是疾呼时多音节合成单音节词。这种描绘使楚语以及吴语在通语的文字中（汉语）的种种反常音译现象得到了较合理的解释。楚语是什么样子呢？与今日南方的少数民族语言如彝族的语言是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一问题将在后面讨论到。

湖南长沙出土了一支矛，上面有一百来个符号，（《楚文物图片集》）。同时在长沙出土的还有一支戈，上面有七个符号。这些文物都是在当年楚国领地范围内找到的。这些符号既不是图画，与甲骨文、金文、小篆也没有共同之处。应说是属于另外一种与当年汉字体系不同的另一种文字体系。“据目前资料所示，这些文字不可能是百越文字，因为百越似乎还未有自己的文字。”^⑪这些文字，按李氏的看法，就是古楚文字。

楚语在春秋战国时的应用非常普及，这从扬雄的《方言》一书注明的例子中可以见到。《方言》记载了三百多个词。另外，

《说文》、《淮南子》许注和高注、《楚辞》王逸注、《尔雅》郭注、《周礼》郑注、《水经注》、《左传》、《初学记》等书也记载了近二百个楚语词。由此可见楚语在春秋战国之时的势力之大。楚国在春秋时是个大国，在春秋之前也是一个大族。于春秋时它吞并了许多国家。其中不少是周室后裔的姬姓国。楚虽是一个大国，但在吞并这些周系国家时也避免不了为这些国家的文化所影响。历史上入主中原的许多西北少数民族往往最终都为汉族所同化，包括他们的语言文字。前者如楚语与楚文字，后者如西夏语与其文字，契丹语与其文字，女真文字，以及满语及满文。入侵者反为被侵者在语言文字上所同化掉的事实在世间民族史上屡见不鲜。这也就解释了后期的出土楚器铭文、帛书、楚简中的文字与殷周文字体系相差不是太大的情况。但是在其风格及体式上，还较大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如上面所举的仰天湖楚简的文字。

当一个使用不同语言与文字系统的民族与另外一个民族融合在一起时，语言与文字的借用与混用就极其明显地显示出来。先秦古籍中那种文字假借现象，文字本身结构中偏旁不定，可上下左右易位，以及一字多形，一字多音等种种混用现象难道不是这种民族融合的结果吗？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字，其“文字异形”的特点也还强烈地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其不隶属于周系文字的独创字（古楚文残余字）数目很多。有的至今仍未释出。如鄂君启节之“菰”字，有释为“茂”，^⑧有释为“哉”^⑨并应读之为“初”音等一直疑莫能定。第二，与周系文字笔画大相径庭的残存笔画很多，如楚器中的帛书、鄂君启节等文物到处可见。第三，有许多不属于周系文字的独特字体结构。这些不同的特殊笔画及结构并不是在短期内可以破译的。这从

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古楚文与周系文字巨大的不同之处,因为即使在与周系文字的相融过程,其残余的部分结构仍会使古文字学家感到一筹莫展。由此可见,其原来的真面目不是更复杂或陌生吗?第四,在战国楚文字中还存在着一些独特的假借字。这些假借字仅在楚国内使用,如“胃”字。在长沙帛书及楚简都有此字,但在许多场合下应读作“谓”或“畏”。又如,“壘”假借为“成”字等等,这才仅在楚国内独特假借的例子。第五,楚文字还表现为繁简不一,形制多样。^④同一个字可因地而异,同一个字可同地而异,让人感到其书写的随意性。^⑤最为严重的是,同一个字,形符、声符可以不同,如“簠”字,信阳竹简写为笑,从竹夫声;江陵竹简写为匡,从匚古声。这些都很清楚地说明了文字融合时的那种混乱情况。

科斗文字又被用来称呼中国西南的彝族文字。彝族文字在汉文献史中被称作“爨文”。起源于何时何地至今仍尚未定论。贵州《大定县志》曾记载:“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赀书。”彝族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会意诸义。书籍有曰理命,言性理者;有曰直载,记世系事迹者也;曰辅苏,巫祝书也;曰弄恩,雅颂也;曰怯主,风歌也。又有堪輿,禄命书。”由此可见,当时彝族文字已大量存在,内容有历史、哲学、文艺、天文等。^⑥

彝文在史志上除了称爨文外,又称为倮文,罗罗文,是一种音节文字。《天启滇志》说:“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有趣的是,彝文字中有不少六国系古文字被用来表达音节。彝文中今日的汉字词汇不少。尤其以六国系古文字为多。有人认为,彝文中六国古文较多的原因在于“六国系古文字(包括货币、兵器、陶器、玺印文字等)承袭东土古文字而来,比小篆要简单得多,实

用价值较高，特别是货币文字，‘流行于当时当地，人尽可知’（马衡语）。^①

彝文“左翻”而楚文尚左。^②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左传·桓公八年》记载，楚伐随时，季梁对随侯说：“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楚国的官职之中，以左司马在右司马之上；左尹在右尹之上；左领在右领之上。楚军队中的三军：中军是主力，而左军在右军之上。孔子在赞扬齐国宰相管仲的功绩时说：“桓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是鲁国人，他的话反映了齐鲁尚右风尚与楚国尚左风尚的区别。《史记·项羽本纪》描绘刘邦赴项羽的鸿门宴时，也指出了这种尚左的风俗：“项王、项伯东向左，亚父向南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待。”项羽向东坐是自居尊位而当仁不让。亚父范增向南坐，于东向者为左；沛公刘邦北向坐，于东向者为右；就坐向而言，沛公刘邦屈居范增之下。刘邦此时恰如锅中之肉，随时可以被项羽吃掉。其座位不在左边，恰恰很形象地描绘出项羽此时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心境。而与之相反的是周人的尚右风尚。今日汉字的书写方式（行款）的组成大约与周人的这种尚右风尚不无关系。方位概念往往反映了一个民族理解事物的出发点与他民族的不同之处。在这个意义上说，彝族的“左翻”行款方式与楚民族的尚左风尚是有着族源上的共同根源的，也就是他们文化上的共同性。

彝族的来源比较可信的应是所谓东来之说，即楚国境内的部族。^③《新唐书》记载过楚威王时楚将庄跻入滇，此后“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跻之裔。”庄跻入滇时“楚之公族多从行。”南北朝时，彝族的祖先曾自称“系出于半”。唐代南诏也自称“九隆”之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彝文中记载了许多彝楚语的共同成分。《楚辞》、《老子》、《淮南子》等著作中有许多自汉以来聚讼纷